

亲历长征

汤少云 蒋凤波 / 主编
王欣田 / 副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20世纪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人类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壮丽史诗，是中国人民闹革命、求解放显示巨大精神力量的光辉篇章，是正义征服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英雄凯歌，是为人类树立坚定无畏的历史丰碑。这一激动人心的远征，将永远铭刻青史，流芳千古。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应山西人民出版社之约，我们约请部分健在的老红军，讲述或撰写亲身经历长征的感人故事，编撰成《亲历长征》一书。旨在宣传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缅怀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讴歌红军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弘扬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学习红军忠于革命、忠于党的高贵品质，继承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

《亲历长征》事迹生动感人，人物朴实可敬。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经历过的重大事件、重要战役、战斗，以及红军将士历尽艰辛的战斗生活，生动地再现了红军将士闯关夺隘、不屈不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悲壮历程，从不同角度、不同经历反映了红军前辈的革命英雄主义

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一部研究党史、军史难得的第一手史料珍品，也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后人为振兴中华而艰苦创业奋发进取的极好教材。

《亲历长征》的作者，我们约稿时均健在。这些可亲可敬的革命老前辈及其亲属和有关人物传记组的同志，对该书的编撰出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若今后条件具备，《亲历长征》我们拟系列出版，届时敬请广大读者和专业工作者提供素材，不胜感谢。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以示我们对红军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和深切怀念。同时奉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的一代新人，启迪大家思索，在国家昌盛、社会安定、享受幸福生活的今天，我们应该从书中汲取点什么？！明白点什么？！

编 者

2005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1
孤军长征	刘华清 1
忆长征	张 震 35
历尽艰辛的长征	廖汉生 59
接应中央红军	洪学智 106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	萧 克 130
人生难忘惟长征	黄新廷 148
我亲历过的长征	杜义德 168
踏破万里长征路	王诚汉 187
曾经走在长征路上	曾克林 224
长征途中	吴 西 246
亲历划时代的长征	阎捷三 269
编 后 语	307

刘华清



1916年10月生于湖北大悟。1929年参加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团委书记兼少共县委书记，政治指导员，科长，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冀南军区组织部长，军分区副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旅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1954年赴苏联海军指挥学院学习。1958年后，历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1987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9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88年授上将军衔。1985年、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孤军长征

秘密出发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秘密出发的。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踏上了长征之路。和有些苏区红军部队不同的是，我们的出发，没有父老乡亲十里相送。

红二十五军终于决定进行战略转移，是花山寨会议的结果。花山寨位于光山县西部，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此召

开了常委会，讨论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半年前就酝酿过。3月中旬，鄂豫皖省委就接到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文件，提出了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经过讨论，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改向老苏区的边沿，恢复、开辟新的苏区。7月1日，省委同时收到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央在信中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并强调，“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信中，中央对为什么转移、转移的目的、新区的选择条件等都说得非常清楚。遗憾的是，信收到得太迟，而同时收到的军委军事训令中，却“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活动”。这一训令发出的时间在后，应视为新指示。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就被搁置了。

花山寨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会议从战略高度审时度势，正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下定了战略转移的决心，解决了走不走的问题；第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为初步转移目标，解决了转移方向的问题；第三，红二十五军在行动中，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解决了举什么旗帜的问题；第四，留下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解决了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

会议还决定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委员、省委常委，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军政治部主任；留下省委常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领导



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高敬亭没能参加会议,会后由省委给高敬亭写了一封指示信,说明花山寨会议的情况和决定);省委书记徐宝珊、省委常委郑位三率省委机关随同红二十五军一道实行转移。

程子华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郑位三把会议决定向程子华作了传达。程子华提出,中央派他来是当军参谋长的,请郑位三报告省委,他不能当军长。徐宝珊表示:“省委已经作了决定,就不要再变了。”程子华没再坚持,成为红二十五军军长。

花山寨会议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便西移到罗山县殷家冲、何家冲一带,加紧出发前的准备。郑位三、戴季英把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机关人员集合起来,传达了省委指示:鄂东北地方武装西路军补入红二十五军,两个机关人员做一些精简,除年老体弱的留在地方坚持斗争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二十五军,随红二十五军一起行动。郑位三还专门把我和程坦叫到一起,说,道委机关留下的人员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省委办事机关与军部机关合为一体。他让我们做好留下人员的工作,到何家冲后抓紧时间准备,并特别嘱咐我,一定要把刻字、油印等物品带上。

到何家冲后,红二十五军立即整编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3000余人。准备工作的另一项内容是进行政治动员,讲解斗争形势,让大家做好“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心理准备。同时做好行军物资的筹备,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实行轻装,每人准备三天的干粮、两双草鞋。

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匆忙。特别是一些伤病员,他们都不愿

留下，到处找各级领导，争着吵着要随部队走。我和一些老同志都还记得，红二十五军出发时，统计是2980人。实际许多伤病员都跟着走了，而且还有一些女同志，更是闹着要跟部队走，最后有7名女护士参加了转移。所以说，实际人数应该是三千挂零。

我和程坦等人被编入红二十五军政治机关。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找我和郭述申分别谈了话，他对我说：“你是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来的，你就担任组织科长吧。郭述申当宣传科长，他是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团里当政治处主任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谈话后我们就立即行动。我不理解的是，对我的这次任命，戴季英后来一直没有公开宣布过。数十年后，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郭述申回忆起了这一情况，说：“戴季英同志和我谈过当宣传科长的事，也谈了让华清同志当组织科长。”戴季英对采访的编写人员也回忆起了这件事，并说当时是这样定的。

军政治部人不多，但有一个宣传队，队长是程启文。程启文性格开朗，爱说爱唱。1992年他从湖南来北京，饭桌上，我们回忆起红二十五军的经历，他开玩笑说：“那时你是组织科长，我是小宣传员。现在你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还是个老兵。难为你还没忘记我，没忘记我们的战斗友谊。”他还讲了长征时差一点儿被当反革命抓起来的事情，说：“真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否则我就被抓到保卫局去了。”说着，还拿出一份材料让我看，上面写了当时的经过。那是长征刚过铁路时发生的事情。出发前，军政治部机关的思想动员很简单，只讲要“打远游击”，不提、也不敢提要离开苏区去创建新的根据地，怕有些年轻战士不愿离开家乡，闹思想情绪。但大家还是若明若暗地知道了，都是青年人，到了一起难免发



议论。当时以为说完就完了，谁知过了平汉铁路，戴季英把我叫去，说政治部管发文件的袁克福向他报告，陈鹤桥、程启文几个人在一起说怪话，要逃跑投敌，让我带人去把他们抓起来送保卫局。我当即说，不能抓，这几个人我了解，我常和他们在一起，我相信他们是不会逃跑的。我又讲，现在就要转移了，抓人会影响大家的情绪。戴季英想了想，说，那你要负责帮助他们。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错误抓人。对戴季英，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都了解，这个人思想比较“左”，办什么事爱搞点神秘性，鄂豫皖“肃反”时就错抓过人。

长征出发前一天，郑位三把省委决定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原稿交给我，要求快速刻印，多印一些，发给部队。出发前来不及发，就边走边发。原件落款时间是1934年10月10号，这是农历，公历应为1934年11月16日。我连夜把《宣言》刻印出来了。有趣的是，时隔50多年后，这份文件在陕南庾家河镇一家农民的老房子里发现了。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人让我辨认。我认真看了看，没错，真是我当年刻印的。《宣言》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当时中华民族危机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

“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现当出发之时，特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

刻印完《宣言》的当天晚上，我躺在稻草铺上，好久没有睡着。要“打远游击”，远到哪里呢？这不是要离开生我养我的大别山吗？就要与鄂豫皖边区的父老乡亲离别了！我想起了家乡，想到了

亲人。好几年没回家了，不知母亲现在怎样？家人怎样？这次远离，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和亲人重见……想了很多，但我知道，大军必定西行。我决心抛去一切留恋，革命到底。

在一个阴冷的夜晚，我们踏着坚定的步伐，秘密出发了……

岁月如梭。60多年后，有人写过一首《惜别》诗，我看很符合我们当时的心情：

壮士征战去，依依别柴门。

乡关一捧土，牵牵思故心。

远谷正落日，寒风催征人。

回首遥相望，惜别又一村。

夜空惊飞鸟，铁马疾行军。

举目平汉月，军中泪无音。

男儿亦多情，远足重千斤。

前行生死路，谁人说与君？

独 树 镇 负 伤

独树镇之战，是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一仗。

我们行军速度很快，第二天，在罗古寨击退了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当晚在信阳城以南穿过了平汉铁路。我们把过铁路当做一大难关。通过铁路后，都松了一口气。在距铁路几百米远的地方，我们躺在山坡边，等待后面部队过来。省委书记徐宝珊和我们同时过了铁路，也躺在山坡上。看来他对过铁路也曾很担心，这时见我们都不说话，就大声说：“同志们，我们取得了大胜利，过了一大关。”



后卫部队过来后，我们迅速向西挺进，进入桐柏山区。按原计划，我们准备在桐柏山区创建新根据地，但经过实地考察和地下党组织介绍，这里靠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小，加之敌人大军迫近，我军难以立足发展。于是决定放弃原计划，向伏牛山挺进。

为迷惑敌人，我们派出小部队佯攻枣阳。敌人果然上了当，纷纷向枣阳一带靠拢。没想到我们突然掉头东返，冲破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的拦阻，击退了敌第五支队的进攻。晚上，准备在桐柏县一个村子宿营，部队突然紧急集合。军政委吴焕先作简短动员：行军走路不能总走直路，要走弯路，革命也要走曲折的路，走艰难的路。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危险区，要准备走路。接着，部队连夜出发，脱离了险境。

过泌阳后，沿途地势平坦，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很多，一般都有武装，多的有数百支枪，我们经常遭到袭扰。吴焕先政委决定开展政治攻势，每到一地，都由郑位三亲自写信，派手枪团先行一步，将信送到沿途村庄寨主手里，或请围寨之间互相传递。信中除了宣传抗日救国，还说明我们是借道抗日，决不伤害地方，请勿阻拦。路过每座围寨，宣传队的同志也都扯着嗓子大喊一阵顺口溜：“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这么一来，形势大为改观。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各阶层的人们对沦为亡国奴的忧虑和恐惧与日俱增。我们的宣传工作，对沿途地主豪绅阶层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们纷纷表示中立，有的甚至很友好。我军通过时，有些围寨的团丁就把枪架起来，徒手站在顶台上；不少围寨还在路旁摆了开水和饭食。有一次，我们政治部

甚至就在围寨跟前露营。

经过两天急行军，我们顺利通过围寨地区，来到驻马店西北象河关一带。这里离许南公路不到60里，过了公路，就是伏牛山东麓。

麻烦的是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一直摆脱不掉。11月25日，我们打退了他们的进攻。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追上来了。军领导决定，第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军直属机关分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阻击敌人，掩护全军通过公路。

这天正好来了寒流，气温陡降。天空阴沉，朔风吼，雪花飘，一片混沌迷茫。我们衣着单薄，很快就湿透，大家饥寒交迫，行进十分艰难。许多同志的鞋子都被烂泥粘掉，只能赤脚。我脚上的鞋子也成了“逃兵”，只好光脚板走路。我们必须抢在敌人前面穿过公路，当时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有一个念头：走，走，快点走！

没想到的是，更大的危险还在前面。事后才知道，敌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南下桐柏山合围扑空后，立即掉头北返，抢先占领方城县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构筑工事，并与保安寨的骑兵团组成了堵击线，而我们还蒙在鼓里。

我随军直属队走在二二四团的后面，见军政委吴焕先一会儿走到队伍前面，一会儿又到后面。行军速度太快，不少同志掉了队。我们走进独树镇时，忽听枪声大作。不一会儿，就见前面队伍潮水般地退下来。在他们身后，是敌人和雨点般的子弹。

千钧一发之际，军政委吴焕先握着大刀，像尊战神，大吼一声“站住”，堵住了退下来的部队。他高喊：“不准撤！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边喊，边冒着弹雨，带领二二五团反扑过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吴政委的举止让我热血沸腾，我也举枪高喊：“冲啊！”跟着冲上去。这是平原地带，没什么隐蔽物，只有一些麦秸垛。向敌人反冲锋时，跑着跑着，我觉得左腿被重重地敲了一下，身子一歪就倒了。我赶紧爬起来，一看，左腿踝骨上边被子弹穿了个洞，鲜血直流。当时也不觉得痛，还要冲。但刚一站起，又摔倒了，被后面的人抬了下来。

好险哪！二二四团是前卫部队，由于天气太坏，能见度低，没有及时发现敌情。等敌人开火后，前卫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更不利的是，由于寒流袭击，许多人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零星打响的火力，无法实行有效的反击，慌乱中只得后撤。幸亏吴政委及时赶来，顶住进攻，赢得了短暂时间，使后续部队投入战斗。激战中，徐海东带领的后卫队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一番血战，终于将敌人打退，敌我转为僵持状态。

天黑后，风雪大作。我军乘机后撤到10里外的村子稍事休整。腹背受敌，如不能迅速离开，我们这支孤军就会被迫与数万敌军决战，后果可想而知。

军领导决定连夜突围。部队紧急集合，而这时绝大多数人还没吃上饭，大家感到极度疲劳和饥饿。战士中很大一部分人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的更小，听说又要出发，就不乐意，待在群众家里不出来。干部们只好挨家挨户叫，总算把部队拉了出来。最不好办的是伤员。风大、雨大，道路泥泞，要迅速摆脱敌人，就不能带伤员走。军领导决定把伤员就地安置，多留一些钱，动员群众保护伤员安全。

这次战斗中负伤的不少人都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伤员被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留下大洋。我的伤口经过处

理，血已止住，也不那么疼了，但不能走路。听说要把我就地安置，我立即表示坚决不留下，一定要随军行动。我很清楚，留下必死无疑。当然，拖着伤腿走可能也是死，我想，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中。

人生中有一些命运转折的关口。对于我，这次负伤算是一回。我的情况被反映上去后，政治部主任戴季英说：“那就带上他吧。”这一句话，让我成了最幸运的伤员。当时政治部机关按人员情况配备牲口，我和程坦两人合用一匹小马驮东西，因为有伤，这匹小马就让我骑了。后来听说，留下来的伤员大多数被敌人杀害了。靠了那匹可爱的小马，我跟上了部队。我一直很感激戴季英和那匹小马。事过60多年后的1996年6月，我到河南考察工作，在郑州看望了戴季英，他91岁了，但头脑还很清楚，还记得独树镇战斗。遗憾的是那匹小马再也见不到了。

独树镇之战，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的生死存亡。情势之险恶，战斗之惊心动魄，至今历历在目。当地政府后来在这里建了“红二十五军血战独树镇纪念碑”，1997年11月26日举行了揭碑仪式，我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我们终于进入了伏牛山。习惯于山地作战的指战员，见到大山，一片欢腾。伏牛山位于豫西南境内，自古以来就被称作“盗匪的渊薮”。国民党军的将领刘镇华、樊钟秀、张钫等人，都是从伏牛山拉杆子起家的。此时，被称为“内乡王”的别廷芳，已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伏牛山以北的南召、嵩县、卢氏境内，这个土皇帝后来也曾显赫一时，被蒋介石封为南阳13县联防司令。当初程子华就曾建议把部队拉到这里。

我们很快发现伏牛山不适宜创建根据地。这一带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和其他物资条件都很缺乏；别廷芳在此经营多年，反



动统治十分严密，不利于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敌第四十军和“追剿纵队”主力仍追得很紧，一时难以立足。省委和军领导研究后，决定马上转移，到陕西南部开辟根据地。我们再次改变计划，兼程西进。

12月4日，我们来到河南卢氏县的叫河。我的腿伤已经有了好转。前面就是一条入陕大道。从叫河经朱阳关到商南地界，不过七八十里山路，一天就可以走到。进入陕南后，就完全可以摆脱尾追之敌，并在商南县境内站住脚跟，开创新局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们都很高兴。

手枪团报告，地处豫陕交界的朱阳关、黄沙镇、五里川等地，3天前就被敌军占领了，堵住了我军入陕之路，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原来，蒋介石为了防止我们入陕，早在半个月前就命令驻守开封的原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乘火车到灵宝，然后步行到朱阳关一带，控制了入陕通道。后面，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也跟踪到了栾川、庙子一线，我军又处于被敌前后夹击的险境。这时碰巧遇到一个叫陈廷贤的货郎小贩，在他带领下，我们沿着一条很少有人知道的入陕小道，绕过朱阳关，直插卢氏县城。

12月5日晚，我们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插了过去。卢氏城里的民团十分惊慌，紧闭城门，在城墙上打着灯笼火把壮胆。我军迅速西进。12月8日，我们从豫陕交界的铁锁关进入陕西境内。铁锁关，又名箭杆岭。据说明末李自成兵败商洛山后，在此设关，并以铁锁锁闭关门，留下了“铁锁关”之名。关上有民团把守，被我军一举攻占。当天下午，我们又急行军近40里，经大石河到了三要司，接连攻占九泉山高地，歼灭陕军一个营，又翻越蟒岭，到达了庾家河镇。

在翻越蟒岭时，我的处境很狼狈。我们走的是牧羊人带羊群爬行的山路。部队虽已轻装，但军供给部还有骡马、挑夫，走起来更困难。我负伤已十几天，虽可以走路了，但这样的山路，走起来还是很不方便。我忍着痛，一步步蹭着往前走。上山很费力气，左腿又使不上力，有时只能爬行。后来，见前面有匹马，我就紧紧抓住马尾巴。我一下子增加了一匹“马力”，轻松多了，算是闯过了这一关。

晚上我们宿营庾家河。这是一个高山峡谷中的小镇，几十户人家，南北两条小河。镇里有条狭窄小街，分上街下街，在中间拐弯，就像拇指、食指分了叉。街面上有几家店铺，拐弯处有一所中药铺子，军部就设在这里。当晚郑位三交给我一份材料，让连夜刻印，第二天早上要张贴出去，说是吴焕先政委决定的。这是一篇很短的传单，标题是“什么是红军”，把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写得一目了然。记得末尾还有一句十分令人自豪的话：“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刻印好的传单交给宣传队。早饭后，宣传员就把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告示贴上了街头，传单上“什么是红军”五个铜板大的字特别显眼。夜里没有休息，我想抓紧时间睡一会儿，突然听到激烈的枪声，赶紧起来。原来敌人从东山坳口摸上来，军领导已带部队上去了。

战斗胜利结束，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却负了重伤。部队伤亡不小，3个团调整为2个团；军的领导也作了调整，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位三为军政治部主任。

庾家河战斗结束了红二十五军历时20多天、长驱两三千里的长征第一个阶段。这一仗有效地打击了尾追的敌人，摆脱了困境，



为打开陕南局面奠定了基础。

《战士报》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分两个阶段进行。中途有一次停顿，由此创建了鄂豫陕新苏区。

鄂豫陕边界地区，包括陕西省东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部的部分地区。它北靠秦岭，南濒汉江，地势险要，人民困苦，敌人统治薄弱。我们到来前，这一带就受过党和红军的影响，较适合我军立足发展。因此，在庾家河战斗前，省委会议就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并做出了《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

新苏区的创建，离不开政治工作。重视思想建设，是红二十五军的好传统。创建新苏区的日子里，军政治部创办了《战士报》。我是宣传科长，《战士报》自然由我负责。

在一次夜行军中，郑位三对我说：“经军领导研究，由你担任宣传科长，仍兼秘书油印科长。原宣传科长郭述申担任军政治部副主任，带小部队去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根据地。”老实讲，这个调动我并不高兴。我一直在干组织科长的工作，但也一直只是挂名，没有正式宣布。现在仍然不让我当组织科长，我猜想可能是前段时间让我抓人，抓“反革命”，我没同意，因此受了影响。

郑位三见我没说话，接着说：“吴焕先政委认为你在独树镇战斗中表现很勇敢，可以到团级领导岗位上去锻炼一下，我看现在部队也没有位置，你的身体又不太好，还是和我们一起搞政治工作吧。”